

## 静宁州庙学建修述略

王科社

(甘肃省文物局,甘肃 兰州 730000)

[摘要]明代静宁州城内有两个庙学,一是洪武年间欧阳信始建的洪武庙学,二是嘉靖年间李时中迁建的嘉靖庙学,两个庙学的规模经过多次扩增修葺而成。本文对明欧阳信在州城紫极观初创庙学、郭增更新扩建、刘琉建乡贤名宦祠以及李时中迁建新庙学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。

[关键词]文庙;儒学;静宁

[中图分类号]K928.75 [文献标识码]A [文章编号]1005-3115(2009)12-0025-05

文庙是祭祀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、教育家孔子的建筑物。从唐代以来,各地或即庙建学,或因学修庙,于是“庙学”连称。明代静宁州城内有两处庙学,一处是西北隅的洪武庙学,一处是东南方的嘉靖庙学,两处庙学的规模是经过多次扩增修葺形成的。

### 一

明初,静宁州知州欧阳信在元设儒学于州城西北隅紫极观的基础上,创建了洪武庙学。欧阳信于洪武四年(1371)任知州,在静宁任职九载,创建庙学是其主要政绩之一。《静宁州志》称“承元季丧乱,建署立学,一切创制规划,为静宁重开草昧者信也”。所谓“重开草昧”,是指他把儒学与其他宗教区分开来,最早在州城内建修了庙学。

洪武二年(1369),明朝廷诏令天下郡县立学,“今京师虽有太学,而天下学校未兴,宜令郡县皆立学,礼延师儒教授生徒,以讲论圣道,使人日渐月化,以复先王之旧,以革污染之习,此最急务,当速行之”,“其令天下郡县,并建学校,以作养士类”。<sup>①</sup>此诏反映出朱元璋想通过科举招纳人才,充实各级官僚机构的迫切愿望。洪武三年(1370),建立科举制度,规定以八股文取士,专取“四书五经”命题考试。洪武四年(1371)正月下诏设科取士。在朱元璋的大力倡导和强令推行下,各地掀起兴建庙学的高潮,欧阳信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创建了静宁州庙学。

明初,静宁州城人口稀少,读书人不太多,因此,洪武庙学中的文庙仅为三开间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静宁人口逐渐增加,崇尚科举的读书人也相应增多。到了明中期,紫极观一带儒学比道教兴盛,道教设施大部分变成

了儒学的教育设施,进而行成了“前庙后学”的局面,即文庙在儒学之南。尽管有永乐十二年(1414)、天顺六年(1462)知州史信、郭增先后续建、扩建,但还是显得很窄小,与当时明代静宁州的教育快速发展状况不相适应。再加上天灾人祸,到嘉靖初年建筑损坏严重,正如胡纘宗所说:“庙坠十四,学坠十六,倾者、圯者、坳者、陷者相错,弗良于祀。”<sup>②</sup>嘉靖十九年至二十一年(1540~1542),知州李必敷与继任者李时中在州城东南选择新址,重建了一个高大宏伟的新庙学。

旧庙学日渐荒废,清代被改为朝贺公所。<sup>③</sup>黄廷钰《静宁州志》卷5“典礼”中记载:“自州西之治平寺暨西北隅之紫极观先后为朝贺公所。”康熙五十一年(1712),由知州黄廷钰、儒学学正高如霖等人主持扩建后,在明柱上刻有两副楹联,<sup>④</sup>歌颂皇恩浩荡,祝愿皇帝长寿,表明该建筑就是供奉“皇帝万岁万万岁”龙牌的朝贺公所。因此,清初朝贺公所实由洪武庙学改建而来。

### 二

永乐十二年(1414),知州史信主持进行续建庙学,规模稍有扩大。天顺六年(1462),知州郭增更新扩建,时任翰林侍读的刘吉为此撰写了《重修静宁州庙学记》,并被刻成石碑立在庙中。此碑是静宁文庙六碑之一,<sup>⑤</sup>可惜在民国时期文庙内多次驻军而毁坏不存。弘治年间(1488~1505),学正梁诏曾撰《文庙祭器记略》碑,提到“郭公增于天顺辛巳岁更加详备,其事悉于博陵刘公《庙学记》”。这个博陵刘公指博野(今河北省博野县)人刘吉。

刘吉是正统十三年(1448)戊辰科进士,四朝重臣,历官翰林侍讲读、翰林侍读、礼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、

礼部尚书、太子少保兼文渊阁大学士、太子太保兼武英殿大学士、户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、少保兼太子太傅、少傅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等职,政声不佳,但博学多才,先后参与编纂《寰宇通志》、《英宗实录》、《文华大训》、《宪宗实录》等典籍。<sup>⑥</sup>当时,身为翰林侍读的刘吉为何会为静宁州撰写《重修庙学记》。原来知州郭增与刘吉有着一层特殊的关系。郭增是直隶定州人,天顺三年(1459)由举人任静宁州知州。<sup>⑦</sup>直隶定州即今河北省定州市,刘吉的家乡博野县与定州邻近而且同属直隶省。郭增与刘吉因地缘关系而相识,并在刘吉举荐下任知州,关系自然非同一般。

刘吉撰写记文究竟是在哪一年呢?要弄清这个问题有两条线索:一是郭增重修文庙的时间,二是刘吉担任翰林侍读的时间。黄氏《静宁州志·宦迹志》载,郭增于“天顺三年任知州。兴废举坠,鼎新学庙、隍庙。寻卒于官”,说明他重修文庙应在天顺三年之后。而《静宁州志·艺文志》所录的学正梁诏《文庙祭器记略》讲“郭公增于天顺辛巳岁更加详备”,天顺辛巳岁即天顺五年(1461),《典礼志》又说“天顺六年(1462)知州郭增更新”,表明郭增重修文庙开工于天顺五年(1461),完工于天顺六年(1462)。由此可知刘吉的记文应当写于天顺六年完工之后。刘吉任翰林侍读迟于天顺六年(1462)。天顺四年(1460),刘吉担任太子侍讲读,不久因母丧“忧归”。“宪宗即位,召纂《英宗实录》。至京,上疏乞终,制不允,进侍读。《实录》成,迁侍讲读学士,直经筵,累迁礼部左侍郎。”<sup>⑧</sup>明宪宗朱见深即位于天顺八年(1464),召刘吉参与纂修《英宗实录》和晋升翰林侍读就在这一年。《英宗实录》的总裁官为李贤、陈文、彭时,刘吉也参与了纂修。成化三年(1467)八月,这部书纂修完成。这说明刘吉任翰林侍读是在天顺八年至成化三年(1464~1467),那么他撰写记文就只能在这四年当中。天顺八年(1464),刘吉守孝结束,且又任翰林侍读,按理撰写记文应距郭氏重修文庙完工时间也不会太久,最合理的时间当是天顺八年(1464)升迁翰林侍读之时。

### 三

在郭增更新之后,弘治五年(1482),知州侯明、熊应周接替修葺洪武庙学。<sup>⑨</sup>嘉靖十二年(1533),四川嘉定人刘琬任知州,在任期内重修文庙并创建了乡贤祠和名宦祠。《静宁州志》记载:“琬勤教养,修废举坠,懋绩丕著。后升湖广襄阳同知。及去,州人赋诗饯别,攀辕不忍舍也。”<sup>⑩</sup>

刘琬创建静宁州乡贤祠和名宦祠的时间需要讨论。创建二祠与修建州城东关城在一起,樊鹏《创修东关记》中说:“嘉靖乙未冬,静宁州知州刘琬奉移文报成关城,奉总制唐公、抚军黄公命也……作事于嘉靖十四年三月十三日,毕务于八月二十五日”,“又推其余力,新文庙斋居,创名宦乡贤祠……治成,今升襄阳府同知。”<sup>⑪</sup>总制唐公即唐龙,嘉靖十一年(1532)“总制三边军务,兼理振济”。<sup>⑫</sup>樊鹏明言静宁州乡贤祠、名宦祠的创建在嘉靖十四年至十五年(1535~1536)。康海《乡贤祠记》亦载:“嘉定刘公知静宁州之三年,民安吏畏,礼教聿兴,乃集其士大夫、耆旧谋之。”<sup>⑬</sup>所谓“知静宁之三年”即嘉靖十四年(1535),静宁乡贤祠始建在此年。

刘琬为什么要创建乡贤祠、名宦祠?赵时春《名宦祠记》载:“今天子建元十有余年,海内风向,饬典礼制诏守令,于诸学宫建名宦乡贤祠,春秋举祠焉。所以劝贤昭烈,启佑后人,德音甚备。”<sup>⑭</sup>就是说这事是由皇帝命令各地修建的。诏令一下,全国各地的文庙学宫中都出现了名宦祠和乡贤祠,静宁州自然也不能例外。赵记又称“提督军务、兵部尚书兼都御史兰谿唐公,上承下教,敷政爰发。于是奉直大夫知静宁州事嘉定刘君琬,祇承明命,董作建室”,明言此举上奉皇帝诏命和三边总制唐龙的命令,下得静宁州士绅的支持,诚然是“列妥英灵,允协郡望”。

二祠建成后,刘琬又请康海和赵时春撰写碑记。武功人康海是弘治十五年(1502)殿试状元,与李梦阳、王九思等号称才子,以文学知名天下。因与刘谨同乡,刘谨败后受到牵连而落职回乡居住。<sup>⑮</sup>刘琬请康海撰写《乡贤祠记》时,这位状元公年已60余岁,在老家居住。康海记文说:“祠工既讫,州守刘君遣使征予为记,刻之贞珉,用垂不朽,以告后裔。”由于康海是弘治十五年(1502)殿试状元,静宁的读书人就把“静宁州乡贤祠记碑”称之为“状元碑”。平凉人赵时春嘉靖五年会试第一,历官户部主事、兵部主事、山东兵备佥事、副都御史、山西巡抚等职。他“读书善强记,文章豪肆,与唐顺之、王慎中齐名”。<sup>⑯</sup>赵氏此时正致仕闲居在平凉家园“桃花坞”,与康海曾有来往,关系较密。他应刘琬之邀撰写了《名宦祠记》,记文说:“刘君即得太史对山康子之文,以志其乡之献哲。复征余文,以志诸名宦于碑。”

### 四

嘉靖时期,李必敷和李时中通过多方努力,在州城东南迁建了新庙学,这个庙学在静宁称嘉靖文庙。使人疑惑的是为何在刘琬重修五年就要废弃旧庙学建设新

庙学,这难道不是劳民伤财吗?事实上,迁建新庙学正是静宁州广大民众的强烈愿望。明胡缵宗《迁学庙记》说:“其宣圣庙与学……垂百年矣,庙坠十四,学坠十六,倾者、圯者、坳者、陷者相错,弗良于祀,而敷教之弟子病焉,乃具状以白于州大夫李守(必敷)。”

新、旧庙学的差别很大,布局、规模不能同日而语。旧庙学中“庙附于学”,南院文庙呈一路格局,主要建筑大成殿为三开间;其北面是学宫,主要建筑明伦堂为五开间。大成殿和明伦堂相对窄小,并且“庙逊于学”。两个院落本来就不是太大,里面还添建了敬一亭、崇圣祠、名宦祠、乡贤祠、致斋所以及学正、训导等教职人员的居所,非常拥挤。新庙学的布局仿曲阜孔庙的三路格局,一庙两宫:中路文庙两进院落,依中轴线自南而北顺次为先师庙门、泮池、戟门、大成殿。戟门两侧分别是名宦祠和乡贤祠,外为前院,内为内院,内院东西是廊庑。大成殿后又有儒学训导居住的小院子。

新庙学“庙伟而尊”、“学前而宏”,克服了旧庙学“庙前学后”、“庙小学逊”的缺陷。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是明代中期静宁州人口发展较快,学子数量大增。廪生数额早在明太祖敕建儒学之初已确定,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,读书人数不断增加,宣德以后便在原定额外增设了增广生,并确定了增广数额,其中州学增30人。其后又于额外增取,出现附学生员。附学生员没有数额限制,只要经过考试就可补充为廪生和增广生。到明中期,狭窄的旧庙学已不能适应教育的发展形势,扩建庙学或迁建一个大规模的新庙学成为必然。师生们呈状知州李必敷,要求“崇庙肃学”。

李必敷于嘉靖十五年(1536)接替刘琬任静宁州知州。不到五年的任期内,他始终关注庙学迁建问题,“乃具状,上于巡抚都御史赵公”,<sup>⑩</sup>争取支持,解决经费之困难。这个赵公即正德辛巳年间(1521)进士、河南开州(今濮阳县)人赵廷瑞,时任陕西巡抚。尽管他认为庙学“不弘不敞”,不独静宁一地如此,最终还是批复了呈文,“乃下分守行省议若费”,初步解决扩建庙学的经费。嘉靖十九年,赵公莅静巡视,州学正郝应元及训导、教谕以及学子们纷纷请求迁建庙学。他实地观看了洪武庙学的情形后,明确答复“修既可,迁亦可”,“复下分守行省益若费”,增加建新庙学的经费。

继任知州是山西平定(今太原)举人李时中,“勇决有为,其迁学修城,尤表表者”(黄氏《静宁州志·宦迹志》)。迁建庙学的事儿定了,经费也解决了,他到任后立即着手选址。在城内东南调查民户侵占官地案中,他发现这处官地建新文庙比较合适,只是面积不够大,就

与民户商量,以低廉价格购买下周围的民地。而后再次向陕西行省呈文,请求批准选址。时过一年竟无回文,时不待人,李时中慨然说:“祀为重,教为先,庙弗新,学弗辑,守之责也!崇斯庙,肃斯学,守之责也!事何可缓?工何可懈?”<sup>⑪</sup>嘉靖二十(1540)年初夏卜定吉日良辰,开工修建新庙学。工程进行中,时任陕西提学使王邦瑞莅静视察学校,了解到工程进展缓慢是因为批文未到,立即书面报告巡抚赵廷瑞。赵公催促分守行省批复,准许在新址建庙学,使李时中和静宁州学子们的压力顿时消失。当时嘉靖皇帝推崇道教,有意贬低孔子,如果未经批准而私建文庙要受严厉处分。在巡抚赵廷瑞、提学使王邦瑞的大力支持下,工程进展很快,当年秋天就建成了中路的文庙与东路的崇圣祠,嘉靖二十一年(1542)夏,建成了西路的学宫。

嘉靖庙学仿照曲阜孔庙三路格局,并按实际情况而略加变通,在中路文庙中突出了大成殿,使之扩为七楹即“明五暗七”,采用九脊之顶;西路学宫的明伦堂和东路崇圣祠的殿堂都增为五楹,采用悬山顶。东、西两路稍稍靠前而略小,既左右对称,又陪衬出中路文庙的雄伟高大,突出了对孔圣人的尊崇。迁建中还把乡贤祠和名宦祠改到戟门两侧,敬一亭改到明伦堂后。地方州县文庙一般是不允许七开间,多为三开间或五开间。由于明伦堂和崇圣殿为五开间,如果大成殿修成五开间就不能突出文庙,无法显现对孔子的尊崇。既要避逾制之嫌,又能符合建筑美学要求,只好采用了“明五暗七”的办法。脊檩题记上只写“大明嘉靖二十一年(1541)岁次壬寅夏六月二十一日庚子静宁州奉明文鼎建”等字,而作为主持本州文庙建设的知州李必敷、学正郝应元等并没有把自己的名字写在这块题记上,只是笼统地说“奉明文鼎建”,可谓意味深长。

静宁州新庙学模仿了曲阜孔庙很多特点,棂星门上“先师庙门”四字模仿了曲阜孔庙中赵孟頫的笔迹,明伦堂上的匾额模仿了曲阜孔庙中胡缵宗的笔迹,据流传文庙前的门上两个牌坊上的“垂宪万世”、“删述六经”、“德配天地”、“道冠古今”等榜书全是从曲阜临摹来的。静宁在文庙门上使用仿赵氏书迹的“先师庙门”四字与嘉靖时期“贬孔”政策有很大关系。本来孔庙在汉代曾称为宣尼庙或宣圣庙,唐开元二十七年(739),封孔子为“文宣王”后又尊称为文宣王庙,后来文庙成为文宣王庙的简称。嘉靖时期因“大礼仪”之争,皇帝朱厚熜不仅杖杀大臣,而且认为孔子生前不是君王,他听从张璁的建议更改了祭孔典礼,把孔子降为至圣先师,去其王号,神位改为“至圣先师孔子”,大成殿改称先师



庙,大成门改称为先师庙门。建于嘉靖二十年(1540)的静宁州新庙学的正门上只能题“先师庙门”四字。

静宁州的新庙学建成后,学正郝应元刚好离任,与其弟应规回到老家山东高唐,顺便拜访正德三年(1508)进士、时任山东巡抚胡缵宗,请他撰写了《静宁州迁学庙记》。李时中等命人把这篇文章刻于碑石,立在文庙大殿之前。

## 五

满洲贵族入关后,意识到要巩固政权仅靠本族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,需要广罗英才来扩大统治基础。一方面,满洲贵族因袭明代科举制度,宣布明朝举人、生员都有效,可以继续参加科举。顺治初即颁诏天下,“我国家受天眷佑,肇造东土……文武制科,仍于辰、戌、丑、未年举行会试,子、午、卯、酉年举行乡试”。<sup>①</sup>顺治七年(1651),谕令礼部,“帝王敷治,文教为先。臣子致君,经术为本……今天下渐定,朕将兴文教,崇经术,以开太平……朕必不次简拔,重加任用”。这一措施的效果十分明显,正如黄机所说:“五年之间制科者六,得士五千有几。犹恐荆璞或有遗焉,更辟恩拔一门,五年之间,复得士万计。越今十有七载,太仓精米无算矣。”<sup>②</sup>另一方面,满洲贵族推崇儒家思想,提高孔子的地位。顺治二年(1645),封孔子为“大成至圣文宣先师”,号召各地各级官吏捐献俸禄,兴修文庙与学宫。“孔子之道益彰矣。犹恐典祀久而废也,下诏有司臣工,能捐千缗者即行纪律”<sup>③</sup>,各地文庙焕然一新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静宁州就对庙学进行维修。“嘉靖庙学”经历了嘉靖三十四年(1556)、天启二年(1622)、天启四年(1624)、崇祯二年(1629)、顺治十一年(1654)五次大地震,到顺治十六年(1659)已损坏严重,的确急待重修。

这次主持维修静宁州庙学的是知州李民圣和州判骆起明。李民圣于顺治十六年(1659)任知州,修复庙学后于顺治十八年(1661)升任四川顺庆府知府,曾主持编修清代第一部《静宁州志》。骆起明由鸡丘令谪任静宁州州判,黄氏《静宁州志·宦迹志》记载他“端静自持,为姚江之学(即王阳明心学),日以文章与州士相勉,一时出其门者甚众”,评价甚高。在这次修庙学工程中,骆起明是知州李民圣的得力助手。他们二人响应顺治皇帝的号召,带头捐资千缗,维修庙学。在他们的影响和动员下,热心庙学的静宁士绅民众也纷纷解囊,解决了维修的经费。

这次维修庙学的时间需要讨论。清黄氏《静宁州志·艺文志》中有黄机《静宁州重修庙学记》,其中记载

“当宣圣之殿劫圯,学宫榛萎,以己丑八月捐资千缗,重为修葺”,讲这次重修庙学在己丑年之八月,也就是顺治六年(1649)八月。但是,李民圣是甲午年即顺治十一年(1654)举人,到顺治十六年(1659)才来任静宁知州的,说他在己丑年维修静宁州庙学是不合情理的。笔者认为维修静宁州庙学当在顺治十六年之后,己丑可能是己亥之误。其次,静宁州判骆起明是“己亥孟春”“谪补静宁”,他到静宁后也参与维修了庙学,己亥年正是顺治十六年(1659)。另外,黄机说这篇记文是在“顺治庚子年”即十七年(1660)撰写,也可以证明维修庙学在顺治己亥年。

当维修工程结束后,骆起明赴京请礼部侍郎黄机撰写了《静宁州重修庙学记》。知州李民圣与黄机同为顺治甲午科举人,属“同门士”,关系颇密。州判骆起明和黄机同是浙江人,所学同门,是“同年友”。顺治十六年骆氏被贬来静宁州前曾向黄氏话别,可见他们的关系也十分密切。所以,在静宁州庙学维修工程结束之后,李、骆二人就想请时任礼部侍郎的黄机撰写记文。顺治十七年骆起明恰有机会到京述职,拜见黄机,讲述了维修静宁州庙学的情况,顺便请撰记文,黄机慨然允诺。黄氏《静宁州重修庙学记》详述了李、骆二人在清初制艺取士、焕新庙学的背景下修葺静宁州庙学的经过,并对他们“有功圣门”的行为给予高度赞扬。骆氏回到静宁后,马上把记文刻碑,立在文庙院中。

## 六

康熙帝在崇儒重学方面更胜其父。康熙十七年(1678)正月,为吸引更多的人才,诏设“博学鸿词科”,许多著名学者赴京应选;二十三年(1686),康熙帝亲赴曲阜祭孔,行九叩礼,赞颂“至圣之道与日月并行,万世帝王咸所师法,下逮公卿士庶罔不率由”,特意御书“万世师表”额,“留曲柄黄盖”,以示对孔子的尊崇,御书“万世师表”匾额;<sup>④</sup>二十四年(1687),建传心殿,以周公、孔子配享伏羲、神农、轩辕等至圣先师,听经筵前亲自祭告、行九叩礼,又为国子监亲篆“彝伦堂”匾额,为孔子庙撰碑文并亲自书写立碑;二十九年(1692),遣内务府修阙里孔子庙。正当朝廷维修阙里孔庙的时候,又下令全国各地兴建孔庙和学宫。康熙三十五年(1698)十二月,康熙帝下诏:“陕、甘沿边州县卫所,当师行孔道,供亿繁多,闾阎劳苦,其明年地丁银米悉行蠲免。”<sup>⑤</sup>这份诏书中所谓“师行孔道”,实际是指兴建文庙和学宫的举措。正是康熙帝的明令,才出现了陕甘一带大规模维修或兴建文庙和学宫的行动,知州董守义命在此

背景下重修了静宁州庙学。

董守义是镶白旗人,由“荫监”<sup>①</sup>而任静宁州知州,《静宁州志》记载他“兴废补坠,如修庙学,创蜡祠,造石桥于南河,墙置仓敖,补葺六房,建置式廓,不惜千金”。他修庙学不是简单地修补,而是大规模地重修。静宁州庙学是中国传统的木构建筑,一般经过四五十年就要进行小规模维修,若经 100 多年,材料大多朽损,就要重建或大规模地维修。从欧阳信始建“洪武庙学”到李必敷筹划迁建,经历了 160 多年,不得不重新大规模地修建。而从李时中兴建的“嘉靖庙学”到董守义到任,经历了近 150 年,也是不得不大规模地维修。这次重修工程巨大,时间较长,“经始于壬申(1692)之三月,迄工于乙亥(1695)之七月,盖四载而告竣工焉”。维修中更换了大量的木材、砖瓦等,几乎等同于新建。之后在大成殿顶前金檩上留下了一通题记,上面墨书“大清康熙三十五年岁次丙子秋七月既望,奉直大夫知静宁州事知州董守义……重修”等 69 字,在明伦堂前金檩上也留下了题记,上书“时大清康熙三十八年(1701)岁次己卯静宁州知州加二级董守义……重修”等字,可见这次维修是非常重要的。

康熙三十六年(1699)八月,陕西提学宪使武之亨按察学校,途经静宁州,参观了静宁州的文庙与学宫,

从学宫生员姚象穆、古良翰、高宗唐、刘汇宗、李重藻等人的介绍中了解了维修庙学的大致情况。武之亨,湖广德安府孝感(今湖北省孝感县)人,顺治十八年(1661)辛丑科进士。武氏看到静宁州庙学兴盛,了解了知州董守义等重修庙学的事迹,称赞董守义是奉诰“宣德意,行教化”的模范官员。学宫生员们当场请求这位提学宪使大人撰写记文,作为纪念,于是,他欣然写下了《静宁州重修庙学记》,“以昭州刺史董君之贤,且为后之莅斯郡者观”。之后,静宁州人就把这篇记文刻成石碑,树立在文庙之中。2005 年夏,文庙保护维修工程中,从地下找到这通残碑。<sup>②</sup>

## 七

自董守义重修之后,静宁庙学还经历数次小维修:康熙五十七年(1718),因地震学宫倾塌,学正朱照乘进行补葺。乾隆十年(1745),知州王烜修文庙、崇圣祠。乾隆四十七年(1782),“知州□□□和学正邵□□修学宫。”<sup>③</sup>道光十九年(1839),张嗣炳重修文庙。咸丰年间(1851~1861)康士雅修学宫。同治年间,张培竭力筹措,进行维修,使学庙“成魏焕之观”。周应沅曾任静宁学正,也修过学庙。光绪三十二年(1906),程德音又修学庙。1920 年,因地震文庙西庑倒塌,王曜南倡导维修。

## [注 释]

①《明史》卷 2《太祖纪 2》。

②①⑦⑧⑨⑩胡纘宗:《静宁州迁庙学记》,见清黄廷钰修《静宁州志·艺文志》。

③明清时期,京师之外的官员每逢节日或庆典在当地要向“皇帝万岁万万岁”龙牌跪拜行礼,以示朝贺。这一活动又叫“拜龙牌”。朝贺之处就叫朝贺公所。

④其一曰“太极弥纶,统动植飞潜,奚非资生资始;皇恩浩荡,合东西南朔,莫不来享来王”,其二曰“八荒沐圣恩,愿卜世卜年,与天地同寿;六合歌王化,祈如山如阜并日月共长”。

⑤静宁文庙六碑,即刘吉重修静宁州庙学记碑、康海静宁州乡贤祠记碑、赵时春静宁州名宦祠记碑、胡纘宗静宁州迁庙学记碑、清黄机静宁州重修庙学记略碑、武之亨静宁州重修庙学记略碑。

⑥《明史》卷 109《宰辅年表》、卷 168《刘吉传》。

⑦⑧⑨⑩清·黄廷钰:《静宁州志·宦迹志》。

⑧《明史》卷 168《刘吉传》。

①③④清·黄廷钰:《静宁州志·艺文志》。

⑫《明史》卷 202《唐龙传》。

⑮《明史》卷 286《康海传》。

⑯《明史》卷 200《赵时春传》。

⑰《清史稿·世祖纪》。

⑱《清实录》卷 117《清史稿·圣祖纪》。

⑲《清史稿·圣祖纪》。

⑳官员之子以荫恩入监者。

㉑碑为土黄色沙岩质,失去碑首、碑座,碑身左上角残缺,正面磨得较光,上部浅线刻成三个方框,中框内刻小篆书“静宁州重修庙学记”八个大字,两边框内线刻凤衔丹书图。中下部两边刻卷草纹,中间刻文字。碑文均为楷书,共 22 行 762 字。

㉒明伦堂后金檩题记有“时大清乾隆四十七年岁次壬寅静宁州知州□□□学正邵□□吏目田□□督工生员……廩生王□□……监生……生员王□□……画工□□□翟□□木匠赵□□泥匠……重修”等字。